

《活着之上》的超越与限度

侯玲宽

(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 甘肃兰州, 730020)

摘要: 因阎真的现实主义写作和充满道德诗意的超越性写作与路遥的写作在文学精神上的同构性,《活着之上》获首届路遥文学奖。《活着之上》又一次聚焦于社会转型期和消费语境下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形态和精神裂变,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精神坚守的可能与可贵。《活着之上》打破了同时期知识分子书写的种种弊病,显示了其共时意义的超越性,但在《沧浪之水》的映照下,也显现出了其存在的限度,以及阎真自我超越的难度。

关键词: 《活着之上》; 阎真; 路遥文学奖; 知识分子叙事; 精神坚守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1-0168-05

一、路遥文学奖与《活着之上》

路遥文学奖诞生于备受争议中,从2013年初宣布启动到2014年底首届颁奖,历时近两年,阎真的《活着之上》最终荣获首届路遥文学奖。路遥文学奖之所以争议颇多,很大的因素在于其民间性,鉴于以往民间文学奖的种种问题,有人对此奖颇多质疑也不足为怪。其实,民间文学奖作为对国家文学奖、政府文学奖的一种补充,如果能够严格评奖制度,稳定价值标准,提高评奖的公平性、公开性、公正性和公信力,也可在繁荣文学创作、促进文学百花齐放、建立多样文学标准方面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故而也有人对此奖大力支持。路遥文学奖的创办宗旨意在“倡导文学关注民生和社会底层人群,鼓励和促进现实主义文学创新与发展,挖掘、发现并重奖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上的优秀作品和作者”。从其宗旨中,我们亦可看出其大致的评奖原则和作品选择方向。但路遥文学奖能否坚持下去?未来状况如何?如何走得更远?这些都需我们拭目以待。

《活着之上》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是因其“语言朴实,结构严谨,人物鲜活,叙事富有张力,以绝对的真实书写中国大学精神全面崩塌的现实,展现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1]而获得评委青睐。路遥文学奖的颁奖词为:“阎真的写作与路遥的写作属于同一精神谱系。像路遥一样,阎真先生的

写作,属于清醒而自觉的现实主义写作。反思和批判是他的文学立场,而启蒙和醒世则是他的文学旗帜,他直面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困境和精神痛苦。从《沧浪之水》开始,他就以忧患的态度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关注他们所承受的人格撕裂和道德焦虑。他通过切近的观察,根据切实的经验,写出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冲突,写出了权力对知识的傲慢与扭曲,别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内在力量。到了《活着之上》,随着生活边界的拓展和社会认知的深化,阎真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作为教育者的知识分子身上。从艺术角度看,他克服了《沧浪之水》的过于峻急的主观化和叙事倾向,显示出一种更为深沉内敛的写作风度。他通过精微准确的描写和从容不迫的叙述,揭示了高校的乱象,写出了高校知识分子的不自在、不自由的生活状态。他的深刻有力的描写,就像水里捞出的石头那样,湿漉漉的,给人一种切切实实的沉重感。同样,像路遥一样,阎真的写作也是一种充满道德诗意的超越性写作。他向往《红楼梦》所表现出的古典美和诗意图景,试图在现实之上,建构一种健全的人格理想,建构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图景。对于一个举目四顾心茫然的时代来讲,他的《活着之上》的建构,不仅具有切中时弊的现实感,而且具有照亮人心的理想主义光芒。鉴于阎真与路遥在文学精神上的同构性,鉴于阎真在文学写作上的努力和突破,他的《活着之上》有理由被授予以路遥名字命名的文学奖。”^[2]

颁奖词既对《活着之上》做出了精微的评价,也说明了其获奖的原因:阎真的现实主义写作和充满道

收稿日期: 2015-07-10; 修回日期: 2015-10-10

作者简介: 侯玲宽(1982-),男,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兰州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研究”(12LZUJBWYB110)

德诗意的超越性写作与路遥的写作属于同一精神谱系，具有文学精神上的同构性，这与路遥文学奖的宗旨也是相符的。路遥和阎真的写作都属于批判现实主义基础上的精神性写作，在创作中都表现出了一种对文学的生命执着和高于生命的信仰。但当下的时代较之于路遥的时代已发生了重大转变，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变得嘈杂而混乱，他们面临着社会变迁中的更多逼仄与诱惑，尤其是在强大的潜规则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中，他们一再遭遇着现实生存的困厄和精神信仰的危机。阎真称，这种绵软的“困境”比路遥时代冷硬的困难更无解。因而我们也看到，尽管《活着之上》中的聂致远内心始终有一种尊严和信仰在支撑着他不至于和他人同流合污，没有向这个世界彻底妥协和低头，但聂致远身上的那种精神力量始终是绵软无力的，它的光芒是暗淡的，这份精神的“幽兰”除了“独善其身”，已影响不到身边的任何人，坚守者的犹豫和彷徨也显现出了强大的功利主义力量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巨大侵蚀性和消磨性。《平凡的世界》中那种令人荡气回肠的人性自尊、自强与自信，人生的苦难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那种强大的精神性存在，在《活着之上》中明显不复存在了，阎真作品中的精神诗意变得缥缈而空洞。路遥和阎真都在“零距离”地书写他们各自的时代，面对不同的时代难题和价值抉择，他们都在主人公的人生困境中注入了道德性超越和精神性思考，他们努力超越活着的本身，让一种信念的力量平衡着现实的种种不堪与无奈，从而支撑起活着的全部意义和做人的终极价值，这显示出了他们在同时代书写中的超越性意义。

二、《活着之上》的超越

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数量已经非常之多了，而这类小说又主要以大学为描写对象，有研究者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以大学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不过六十余部，在这其中新世纪就有三十部左右。^[3]尽管数量繁多，但它还远非成熟之作，这之中真正能称得上优秀之作的非常有限。当前的知识分子叙事主要以揭露知识分子的阴暗面为主，故而此类书写大都充满颓废之气，氤氲和传递着负能量，解构远远大于建构。《活着之上》在同类作品中之所以显现出超越性，是因为它传达出了知识分子书写的正能量，给现实中像聂致远一样的知识分子昭示出了希望和信心，正如颁奖词中所言，作品“具有照亮人心的理想主义光芒”。同时它也让新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书写有

了一点自己的尊严，我们终于看到了年轻的知识分子不再一味地沉溺于金钱、权力和情欲的泥淖中，并有了弥足珍贵的精神之气。当前很多作家因过分地将目光集中于对知识分子如何污浊与腐败、如何卑劣与堕落的揭示、鉴赏与玩味中，以至于“我们文学中的知识分子没有伟大，只有平凡，失去了美，只剩下了丑，人格缺乏意志力量和道德力量”^{[4](321)}。知识分子书写因而缺乏一种精神上的光芒，那种精神超越和灵魂升华的大作品却从读者的视域中消失了。这也导致了当前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面貌过于单一，精神极度苍白，失去了此类作品本应呈现的广阔空间与多元格局，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文学现象。卑劣与堕落、污浊与贪腐，现实中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如此，也有清醒的反思者，只是他们在作家笔下被有意缺席了从而得不到展现。这种阴暗书写固然客观地反映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某一层面的真实，但它们在再现生活的同时却没有超越生活，反而降低了它本应达到的创作水准，也造成了一种文本阅读的沉重压抑和创作型态的贫弱暗淡。

对知识分子的欲望化书写是当前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一个共同聚焦点，也是一种非常泛滥的书写模式，它却显现出了作家们对知识分子观察视角的过于狭窄和单一，也突显了作家们内心视域的狭小。伴随着市场经济语境下中国社会的转型，整个社会的价值诉求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社会中的功利主义也扭转了知识分子的价值风标，他们逐渐抛弃了对形而上的“道”的追求与坚守，转而在形而下的“器具”生存中开始了对金钱和权力的疯狂角逐。这是当前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是知识分子之悲，也是时代之痛。反映和批判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原生态生存图景固然是作家的职责和使命，但在大量的作品中我们却发现了作家写作的偏颇，他们因把握不住内心的价值标尺和道德自律而陷入了对欲望的把玩与贪婪展示之中，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欲望化生存也明显存在着暧昧的态度，在欲望的书写中渲染着随意和企羡，批判力度因此被削弱甚至荡然无存。更有些作家因对故事情节的过度虚构和夸张而忽视了文学的真实性这一重要原则，这样的书写其实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作家们在过度展览知识分子在金钱与权力的角逐中显现的丑态、奴相与人性之恶之时，独独缺少了对知识分子的存在之思和价值之问，这就导致了此类书写缺少了最为珍贵的思考能力。思想的贫瘠和创作水准的低下，让当前的知识分子小说陷入了数量繁荣质量不高的怪圈中，反而成为一种失败之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活着之上》显示了对知识

分子书写的独特性和超越性。《活着之上》并不着意于去揭露高校内部的黑暗与腐败,也没有刻意描摹知识分子的群丑形象,而其成功处之一就在于对这两者书写分寸的到位拿捏。作品写到了高校生存的种种潜规则和距大学精神渐行渐远的悖谬之处,但它们都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生存环境的严峻与恶劣。这既是一种现实的真实,也是一种环境的凸显,在如此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如何坚守内在的良知和精神的自足?由此催发了聂致远的痛苦之思与终极之问。知识分子的负面形象也仅着意刻画了蒙天舒一个,而不是群体形象,人物塑造的成功在精而不在多。作品突出的是蒙天舒的能指意义,他指代了当前知识分子生存的一种新常态路径,他背离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要义和责任意识,却能迅速地走向俗世的成功。这也是作品设置的一个反衬,从而在蒙天舒和聂致远之间产生了艰难的辩驳,这是两种不同生存形态的辩驳。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辩驳,也是生存与良知的辩驳,正如作品中所言:“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这注定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艰难之问,现实中的人是复杂的,不可能执一端而生存,执生存而否良知则是堕落,执良知否生存则无法存活。正是因为如此,当前很多作家在创作中将两者视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将功利主义价值观下的生存视为了“更加绝对”,作品因此而充满了权力斗争和金钱气息,那一点精神的理想光芒则消失殆尽。这些作品如长期充斥于我们的阅读视野中,则不但磨灭了我们心中的那些微希望,而且也造成了此类作品模式化的写作弊病。《活着之上》打破了那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从而让作品在选择的艰难中充满了思辨性和无限张力。聂致远因为心中固守的那份良知,他丧失了现实中关乎生存的很多东西,他也因为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生存,而让心中的那份良知一再经受考验,乃至动摇。尽管如此两难,聂致远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达到了理想,他让我们感到现实尽管黑暗污浊,但还是为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保留了一丝缝隙,我们只要努力,还是有阳光有希望。聂致远的精神力量是有根的,它的根深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活着之上》走出了知识分子权力争夺和金钱追逐的怪圈,让本时期的知识分子书写不再阴暗无望,不再徘徊无前,也让当前的知识分子书写走向了丰富和多元,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一种新的向度和可能。这对当前的写作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活着之上》还打破了当前知识分子小说中“言必及情”的滥情倾向。也许是受到传统小说“才子佳

人”模式的影响,很多作家在书写知识分子的时候都有意将知识分子引向了“情”的海洋中,但他们在写“情”的时候又走向了偏颇乃至极端,将情和性必然地联系在了一起。言情则必有性,似乎已成为作家们有意为之的写作策略,也是作家们又一鉴赏、把玩的写作技巧。文学中不是不可写情与性,但写情与性必须要以严肃的态度去表现深邃的人性深刻的思想。如果以游戏之态度为之,则是作家的堕落。当前很多作家在知识分子书写中渗入了过多的婚外情、多角恋爱、不正当男女关系、过度性描写,这已经预示了知识分子小说的某种危机。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作家的阎真,深知高校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存形态,故而祛除了知识分子被过度丑化和夸张的一面,或者说他写出了学院知识分子存在的另一面,它关乎生存,关乎发展,也关乎良知,却不关乎杂乱的情与性。即使在写到上蹿下跳、投机钻营、无真才实学的蒙天舒这样的反面人物时,作者也没有刻意往滥情上引导与靠拢。在主人公聂致远身上,即使在他最失意最无助的时候,作者也没有凭空安置一个给予他慰藉和宽心的异性之情与性。这种书写是最真实的。因为我们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个人独自咀嚼与消化那份孤独与失败,都是一边愈合着伤口,一边从人生的低谷中慢慢爬起,凭空而来的情与性只能让作品流于肤浅与低俗。作品的背后映照的是作者的品格,作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也是在书写自己的思想、理想与追求。《活着之上》中虽有不堪的环境和艰难的生存,也有抉择的痛苦和精神的困顿,但它的格调是纯净的,境界是高尚的,那样一丝深植于传统文化和古代文人骨髓中的道德诗意与精神之光弥久不散,始终支撑着文本和主人公前行。

对市场化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书写不应该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中,它应该渗入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精神底蕴,将此类书写引向深邃与宏阔、精致与丰富,作家们应该让自己的书写承载起文学应有的格调和尊严。“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社会中精神最为复杂因而也是最难解读的阶层,他们最能代表历史、时代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5](1)},正因如此,作家们更应该深入到知识分子内心和灵魂深处挖掘他们最为复杂的思想和精神,而不能将写作流于表面化和自我想象之中,我们仍期待更沉实的作品出现。

三、《活着之上》的限度

《活着之上》虽然在同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中是优秀的，但客观地说，如果将之与阎真之前的《沧浪之水》相比，阎真在写作上并没有超越自己。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我们总是给予了过高的期待，我们总希望他的作品一直处于超越和创新之中，总希望他能贡献出更多优秀之作来弥补当前文学的贫瘠，满足我们的阅读期待。但一个作家的创作精力、内在资源、思考力度、精神视域毕竟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也就是创作的限度。当他达到了自己创作的临界点时，超越就显得异常困难。从古今中外众多作家的创作历程上，我们都能很清楚地感知到这一点。

十余年的时间过去了，《沧浪之水》的影响至今犹在，《沧浪之水》不仅是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即使在当代文学中也是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和《废都》一样，在对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书写上，这是一部注定要被读者和研究者反复阅读的优秀之作，这也就给阎真的自我超越带来了相当的难度。正是因为有着《沧浪之水》的映照，同样书写消费社会语境中知识分子生存形态和精神坚守的《活着之上》所存在的限度就被显现出来了。

就作品的精神品质而言，《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都是在书写消费社会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坚守问题，两者的结局虽然不同，但在这一过程中的精神拷问和灵魂挣扎是同构的。中国社会的转型也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处事方式、做人原则等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还能否坚守住自己的精神高地？池大为和聂致远在生存的巨大压力面前都经受了痛苦的人格煎熬，支撑着他们向世俗社会抗争的都是自己内心的知识分子尊严和古代文人的精神风骨。每当他们陷入精神困境的时候，那种自我营造的心象和精神的乌托邦也成为了其反抗绝望和慰藉心灵的盾牌。但我们也看到这种盾牌是无力的，在现实的强力攻击下，他们还是不同程度地妥协了，尽管他们也为这种不得已找出了有足够说服力的理由，但那种在生存面前的沮丧感和溃败感是深入骨髓的。在这两部作品中，阎真反复思考的是消费社会语境中的潜规则生存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对人们精神信仰的毁灭性冲击，如作品中所言：钱和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它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失去了心灵信仰和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当下社会中严重失根的一个群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悲剧。我们看到，生存的巨大压力、预设的人生理想、精神坚守的艰难、古人精神之光的烛照，这些元素的交锋和矛盾构成了这两部作品的核心与重心。在这些点上，《活着之上》不但没有超越《沧浪之水》，而且还形成了一种重复。

阎真在这两部作品中都运用了一种“复调”式的叙事策略，“复调”不仅是小说的一种艺术特征，也是一种独特的认知话语和思维方式，在深刻剖析现代人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但阎真在这两部作品中运用的复调却是同一种模式的复调，它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对话”，“对话”本来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然而，两个文本中同质的“对话”就造成了一种写作的重复。这种“对话”主要表现为两个类型：一是池大为/聂致远与妻子的对话，其实这是两种不同层面的“自我”，池大为/聂致远象征着精神层面的“自我”，妻子象征着物质层面的“自我”，故而这种“对话”就具有了自我“辩驳”的性质，妻子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在现实意义上是无可辩驳的，它关乎着一家人的生存与发展，池大为/聂致远的超现实主义价值观在精神意义上也是无可置疑的，它关乎着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与良知；再者是池大为/聂致远内心两种不同声音的对话与辩驳，一种声音让他按照现实的逻辑和轨道行进，一种声音让他拒绝世俗的诱惑追寻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这种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矛盾与辩驳成为了贯穿于两个文本的基调。每当在现实中出现不同道路、不同行为的抉择时，这两类声音就会出现激烈的交锋，从而暴露出池大为/聂致远复杂、矛盾的意识特征和性格的双重性，也突显了当生存和精神产生冲突时主人公微弱的信心和犹豫不决的心态。这些微型对话及所产生的辩驳效果是阎真在这两部作品中精心建构的叙事策略，产生了震撼心灵和让人沉思的效果。遗憾的是，这样的叙事策略在两个文本中相继运用，而没有呈现出新的技巧变化和更高一步的叙事推进，这就成为了一种叙事的停滞。况且，《活着之上》较之《沧浪之水》在同样的叙事技巧上还显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退步，明显缺乏深度和张力，效果并不让人满意。

《活着之上》还有着与《沧浪之水》大致相同的人物结构模式和故事核。在表现主人公生存的巨大压力和社会的复杂性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文本中都出现了一个家庭(生活空间)中的“妻子”和一个单位(发展空间)中的“小人”，这种人物设置既对故事形成一种推进，也与主人公的精神人格形成一种映衬，同时也为主人公向现实妥协找到了一个最无可辩驳的理由。在《沧浪之水》中的体现是妻子董柳和同事丁小槐，在《活着之上》中的体现是妻子赵平平和同学兼同事的蒙天舒。可以说，董柳以其妻子的“特殊身份”和“话语权”重新塑造了一个不同于知识分子池大为的官员池大为，能够塑造成功的最合理也是最具说服力的缘由，那就是家庭的生存问题。对于像池大为/

聂致远这样一直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活着,并力图实现精神性存在的知识分子来说,促使他们发生根本人生转向的只能是来自于亲情的力量和现实生存的极致困境。在家庭因素的设置上,物质生存的拮据、住房问题的窘迫、妻子工作的棘手是导致池大为/聂致远信念动摇和精神溃败的主要原因。当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让他们向现实彻底妥协与屈服的时候,孩子(《沧浪之水》中的儿子一波和《活着之上》中的女儿安安)的生存与发展则是摧毁他们心理最后防线的致命因素。所以,当亲情、困境和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池大为/聂致远内心的艰难挣扎和痛苦纠结,并一步步向他们心中背驰的方向悄然滑落。在这两个文本中,阎真以其细致和精致的日常生活叙事显现了知识分子生存的艰难困境和知识分子精神坚守的无以为继,这也可以说是阎真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核和叙事“圈套”。在单位因素上,这两个文本都设置了一个颇具意味和内蕴的“小人”形象:这个“小人”在年龄和地位上与“我”是大致相似的,这样在“我”的意识里两人是旗鼓相当不分高下的,但在实际的人品和学识上他却又远远较“我”不如,所以“我”在心里又很瞧不起这样的“小人”,不屑于与之竞争。但若干时间以后,“小人”通过种种手段反而在单位发展迅速,地位远较“我”之上,让“我”震惊,“小人”在这里成为了一个促使主人公转变的催化剂和活教材。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人的边缘化和“小人”的得势于是成为引起主人公自我反思和警醒的主要因素。除了“小人”的反面刺激,两个文本还分别设置了一个正面“引导”者形象,这个形象是以一个不得势的“智者”面目出

现的,那就是《沧浪之水》的晏之鹤和《活着之上》的陶教授,这个智者为主人公在人生转折的路口上不但解惑释疑,还清晰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推进了故事的发展。在“小人”和“智者”的二重角色作用下,“我”同样也完成了在单位的发展和自我蜕变。从这样类似的人物结构和角色设置,乃至相同的故事核来分析,我们同样看到了《活着之上》的重复和限度。

另外,较之《沧浪之水》,《活着之上》在处理聂致远精神与现实的剧烈冲突时,明显缺乏细致的心理活动描写;对聂致远、赵平平、蒙天舒的形象塑造也显得单薄无神,失去了池大为、董柳、丁小槐的血肉丰满和意味深长,反倒沦为了一种符号化的工具;而作者在故事的结构和情节上,也没能进行娴熟和成熟的艺术处理,有散漫拖沓之感。这些是阎真创作的遗憾,也是我们阅读时产生的遗憾。

参考文献:

- [1] 萧夏林.《活着之上》与第一届“路遥文学奖”——评委原始评语[J].文艺争鸣,2015(5):114-121.
- [2] 李建军.路遥在2015年“三月”[J].文学自由谈,2015(3):11-30.
- [3] 郑飞.新世纪以来大学题材长篇小说的基本类型[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01-205.
- [4] 王卫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5] 易晖.“我”是谁——新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研究·序一[J].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Transcendence and limitation of *Beyond Living*

HOU Lingkuan

(School of Commercial Media,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Yanzen won the first Luyao literary prize for his *Beyond Living* because his writing is realistic yet at the same time full of moral and poetic transcendence, which bears certain isomorphism with Luyao's writing in literary spirit. Once again, *Beyond Living* focuses on the living state and spiritual split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ition and consumption, making readers know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praiseworthy of their spiritual persistence. The novel breaks through the drawbacks of the intellectual writing of the same period and discloses the transcendence of synchronic sense. But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Cang Lang Zhi Shui* shows that *Beyond Living* also expresses its limitation and the difficulty for Yanzen to transcend himself.

Key Words: *Huo zhe zhi shang*; Yanzen; Luyao literary prize; intellectuals narration; spiritual persistence

[编辑: 胡兴华]